

五四运动时期的 反孔斗争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261.05

Revised

K261.05
2

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河南人民出版社



A378376

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册

统一书号: 3105·215 定价 0.11 元

毛 主 席 语 录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中国人民具有反孔斗争的光荣传统。

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孔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场斗争和过去历史上的反孔斗争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参加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使这场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并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从本质上讲，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这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组织起来，并进入上层建筑领域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以新的装束

和新的武器，带着为中国文化斗争史上还不曾有的姿态，跨进上层建筑领域，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孔家店”，直指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以空前的规模，浩大的声势，向着反动的孔孟之道展开了英勇而猛烈的进攻，把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取得了反孔斗争的辉煌胜利，立下了伟大功劳，为以后的反孔斗争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孔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在我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锋芒所向，直指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直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直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必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回顾一下五四运动时期反孔斗争的战斗历程，吸取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时期反孔斗争的革命精神，这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是时代的要求，革命的需要。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发生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历史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就是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即所谓巴黎和会。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地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特权的合理要求，中国的外交，遭到了大失败。消息传来，激起了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伟大的五四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五月四日下午，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和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革命口号，他们火焚赵家楼，惩罚卖国贼，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威风。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和各地的工人相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店，也纷纷举行罢市。这样，五四运动便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它发生的阶级根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和壮大，在中国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根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同上）

可见，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 and 新的经济力量，因而，也必然产生新的文化力量。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正是当时新政治新经济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反映，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是为当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是中国革命进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要求。这是五四运动时期反孔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五四运动时期反孔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反击当时尊孔复古的反革命逆流的需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前夕，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反革命逆流。这股思想界的反革命逆流，是为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上的复辟倒退活动，总是先从思想领域里的尊孔复古开始；而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又为政治上的复辟倒退活动鸣锣开道。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而封建统治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辛亥革命失败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了复辟帝制，实现做皇帝的黄粱美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大造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舆论。正如鲁迅所说：“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从胡须说到牙齿》）他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发布了尊孔令。同年，由袁氏政府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又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尊孔条文，强迫人民信奉。一九一四年一月，又由他的御用机关“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案。同年九月，他率领百官三拜九叩，举行了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大典，并叫嚷什么“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

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同年，袁氏政府教育部拟定的《教育纲要》中，要求“各学校均应崇拜古圣贤，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一九一五年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跟着这些而来的便是洪宪帝制丑剧的演出。然而那一道“幸福之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袁世凯垮台后，保皇党人康有为又勾结号称“辫帅”的封建军阀张勋，再次演出了尊孔复辟的丑剧。康有为这个尊孔复辟的极端顽固分子，竟然以“当代的孔子”自诩，他在一九一三年创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尊孔文章，不遗余力地鼓吹孔教，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大造反革命舆论。他胡说孔教是中国的“国魂”，“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所以，他竭力主张把孔教定为“国教”。到一九一六年秋，他上书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再次叫嚷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并列人“宪法”，还大肆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的谬论。在他大力尊孔复古的同时，恶毒攻击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他攻击这个革命的结果，是使“中国数千年之文明，至民国而扫地尽矣。”我们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孔，象辛亥革命那种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康有为看来，就如洪水猛兽，竭力反对和攻击，可见他的思想立场是何等的反动和顽固！他的最后结论是：“仆审查国情，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德考人心，皆思复辟，而念旧朝。”这道破了他提倡尊孔复古的真正目的。所以，到一九一七年，他就

和封建军阀张勋勾结，再次上演了一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丑剧，把他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

毛主席谈到五四运动时期尊孔情况时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由于袁世凯、康有为等反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鼓吹，中国各地的“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纷纷出笼，群魔乱舞，猖獗一时。“五四”前夕的中国，笼罩着尊孔复古的乌云，真是孔尘弥漫，妖风四起，孔老二的幽灵游荡在当时整个黑暗中国的上空，在全国充满着一种令人沉闷、窒息的恶浊空气。鲁迅后来把当时的中国形象地比喻为一间没有窗户、不透阳光的铁屋子，在这间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有着闷死的危险。

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帝国主义都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在国内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尊孔复古的同时，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和奴役中国人民，也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大肆吹捧孔学，中外反动派同台演出了尊孔大合唱。老沙皇的文化特务盖沙令，在中国多次发表尊孔演说，猖狂叫嚷什么中国只有尊孔，实现“古道之复兴”，才不至使“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他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根本”、

“各种文明的模范”等等。他这种尊孔谬论，被当时的中外反动派吹捧为“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路线”。这只能是袁世凯、康有为的复辟倒退路线。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之流，也说什么“孔子为中国独一无二之圣人”，并鼓吹要使“孔教”与“耶稣教”“互相和合，互相劝勉，互相辅助”，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当时的威海卫行政长官英帝国主义分子约翰斯顿，公然发表《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胡说“保存国粹，盖中国今日所不可不急行提倡之事”，叫嚷什么反对尊孔，就“将以古国之国粹，一一摈弃无余”，“将以东方精神文明之根基，一一毁灭无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也叫嚷孔教“于宪法上应掲出明文”。有的帝国主义分子，甚至吹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中国学术之代表”。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外反动派出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一唱一和地为孔老二大唱赞歌，把他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在二十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孔老二又做定了“摩登圣人”。中外反动派在中国掀起的这股为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尊孔复古的反革命逆流，成了当时中国人民要革命、要前进的严重障碍。但是，时代变化了！熟睡在“铁屋子”里的中国人民觉醒了，他们要革命，要前进，就必须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必须进行反孔斗争，就必须反对孔夫子那一套，如果“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反对党八股》）所

以，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反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掀起的尊孔复古的反革命逆流的需要，是为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扫清道路的需要，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如果“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于是一场激烈的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即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在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五四运动时期，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起来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和新的政治内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孔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新民主主义论》）所以，五四运动本身，特别是六月三日以后的运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最有力的反孔斗争。这个运动大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大造了孔老二不准“犯上作乱”的反，推翻了对反动派“造反无理”的旧案，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局面。

孔孟之道，从它出笼那一天起，就是作为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思想理论武器而存在的。孔老二为了维护没落

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的反抗，制定了一整套十分森严的尊卑、上下、贵贱、大小的等级制度。

“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鲁迅：《灯下漫笔》）也就是说，只许被压迫、被剥削者服服贴贴地“循规蹈矩”地受统治，不许他们起来反对压迫和剥削，不许他们起来造反；如果有人不安分守己，敢于起来造反，那就是所谓“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镇压。孔老二的这种反动谬论，集中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一切反动统治者的需要，是为一切反动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服务的。所以，它长期为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利用。但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五四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把中国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国家败坏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人民痛苦到了极点。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正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在巴黎的分赃会议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侮和干涉，以及中国反动军阀政

府的丧权辱国，又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经受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教育而觉醒起来了，他们起来造反了。他们蔑视孔老二那一套反动谬论，挣脱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大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大造了孔老二不准“犯上作乱”的反，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来对反动派“造反无理”的旧案。所以，五四运动就是一次革命造反运动，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最有力的反孔斗争。站在这场斗争最前列，抓住斗争的本质特点和代表着反孔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后来谈到五四运动时指出：“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党八股》）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实质上，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路线斗争，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要倒退、要复辟，就在思想上大搞尊孔复古。因而，当时复古之风，甚嚣尘上。

尊孔必定复古。孔老二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是搞复古倒退和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他抛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反对新兴的封建制；他死心踏地地逆历史潮流而动，大开历史倒车；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是个顽固的复古派和复辟狂。所以，孔孟之道，就是复辟倒退之道，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用来作为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五四运动时期的尊孔复古派，效法孔老二，大肆叫嚷“今不如

骨”。说什么“世道不古”、“人心不古”、“士风不古”、“斯文不古”、“斯学不古”；他们“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正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因而，鲁迅很痛心地说：“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总之，他们说古代这好、那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古代的帝制好，应该倒退回去，应该复辟帝制。从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和政治上复辟倒退的密切联系。

在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革命战友们，以“浪遏飞舟”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尊孔复古思想和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在长沙组织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和他的战友们，当时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他们朝气蓬勃、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造反精神。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主编了《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为创办自修大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一九二〇年，又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以湖南为基地，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了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在进行这些革命活动时，非常重视思想文化战线

的斗争。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极其尖锐深刻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孔老二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以实现他那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鼓吹什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谬论。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六不怕”，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把孔老二这个反动阶级的“‘圣人’之言”视若粪土，踩在脚下。毛主席非常藐视当时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斥责当时“满嘴平等正义”的法、英、美帝国主义头子，不过是“一类的强盗”，并预言他们的“末日审判”将要到来。当时盘踞在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骑在人民头上作福作威，称王称霸。但毛主席无所畏惧，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同这个炙手可热、凶狠残暴的“大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领导了有名的“驱张运动”。当时美、英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杜威、罗素在中国到处发表演说，大肆贩卖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改良主义思想，同当时已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妄图抵消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类的洋奴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大肆吹捧，弄得声势赫赫，名噪一时。但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对杜威、罗素这样举世闻名的“大人物”，嗤之以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辛